

# 信任型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发展质量影响机制研究<sup>\*</sup>

贾礼文 陆林

**摘要:**文章基于中国社会生活的特质、中国市场资源的分配机制和中国经济社会改革转型的时代背景,指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和重要形式,分析了信任结构由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组成,它与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紧密相关,深刻影响着中小企业的内部管理机制、内外部资源交换和环境适应能力。中小企业在“质”和“量”上拥有丰富的信任型社会资本,能够提升企业的发展质量,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信任;社会资本;中小企业;发展质量

## 一、引言

在世界经济艰难曲折复苏和中国政治经济深度改革转型时期,我国实体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困难加重。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国实有企业1366.6万户,个体工商户4059.27万户,中小企业的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5%以上,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力量。值得关注的是,中小企业在成长中具有明显的特质,例如应变弹性大、家族化管理、生命周期不稳定等;同时也面临诸多发展困境,例如资金筹措困难、人才资源匮乏、技术研发能力不足、管理结构与制度不规范,规模不经济等。在这样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中小企业自身特质与困境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影响乃至制约着它们的发展质量。

## 二、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关于社会资本与企业发展的研究,目前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从网络角度分析企业的可持续成长,认为企业成长的网络资源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为企业成长提供了重要的资源(Miles,1984;Burt,1992;林润辉,2004)。二是从企业家个人关系网络与企业成长的关系进行研究,主要观点是民营企业能否持续成长主要看企业家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弱(贺小刚、李新春,2005;李路路,1998;张岚东,2003)。三是从社会资本结构类型不同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展开研究(Ghoshal,1998;王琚,2003;曹国年,2006)。而对于社会资本,目前尚无一个学者可以普遍认同的定义,从相关学者概念描绘的梳理中,可以得出本文使用的信任型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是,社会资本是一种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被制度化了的关系网络或社会结构,个人或组织通过它可以获得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和动员稀缺资源的能力。对于社会资本和信任的关系,相关文献的表述不尽一样,对于概念交集界限甚至存有争议。如福山近乎把信任等同于社会资本本身,觉得社会资本是从社会的普遍信任中产生的一种能力,这种相对普遍的文化特性决定了国家或地区的福利和竞争能力,也就是社会内生的信任程度(福山,1998);而科尔曼则认为社会资本是信任的源头,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体现形式;普特南认为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而存在。结合科尔曼、福山、普特南、林南和李惠斌、杨雪冬等学者对社会资本及其与信任关系的研究,本文沿用科尔曼的理论观点,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略微不同的是,本文更加强调信任可以作为社会资本的关键性测量指标和内核要素,在很大程度上,社会资本的特质和作用在信任里都能得到体现和发挥。因此从信任视角观察社会资本,可以引出“信任型社会资本”的概念,即信任作为社会

<sup>\*</sup> 贾礼文、陆林,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电子邮箱:591470716@qq.com。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资本的核心要素和重要形式,嵌入在一定的关系网络或社会结构中,个人或组织通过它可以消减网络结构中的部分不确定性和易变性,使互动结果符合双方或多边寄予的期望,从而获得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和动员稀缺资源的能力。

中西学者对中国的信任问题有相当的关注。中国人存在彼此间的普遍不信任,信任并非是建立在信仰共同体而是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家族亲戚或准亲戚关系之上,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特殊信任(韦伯,1995)。与这种特殊信任相对应,普遍信任的对象则延伸到那些我们并不认识的人或可能与我们不同的人(Uslander,2002)。近年来中国社会是否具有普遍信任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下的信任结构仍以特殊信任为主,普遍信任的发育明显不足(林聚任,2007)。也有观点认为相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国是一个普遍信任较高的国家(Inglehart,1999)。还有观点认为中国文化虽然具有特殊主义的特点,但也可以容纳某种程度的普遍信任(王绍光、刘欣,2002)。对于信任与企业发展,有学者认为信任能够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信息使用率、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与经营风险,还能影响企业的规模(许晓红,2004)。

同时,相关理论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质量和先天特质中面临的困境提出了诸多合理解释,特别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嵌入性分析(格兰诺维特,1985)为我们理解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嵌入社会关系之中的。企业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次级群体,它处在与其他群体相互作用的社会环境当中。也就是说,经济生活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它不能与社会风俗、道德伦理、文化习惯分开来单独加以解释。企业的社会性特征会随着其不断发展而得以强化,以至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深刻感受到社会资本以及信任环境对其发展质量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从这个层面来看,在分析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的时候需要从文化视角重视“社会资本”的存在,在解读社会资本的时候则要强化“信任”这一内核要素,即是对信任型社会资本的探讨。着力探讨它是如何参与中小企业各层级的管理运作,是如何协调组织内外部资源的交换和整合,如何促进组织与内外各方良性互动而形成较高的环境应变弹性,进一步追溯信任型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如何。

### 三、中小企业信任结构与发展质量的互动

信任可以维持一定范围社会关系的持续,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能够促进人们的理性或非理性合作,如果人类社会不具备基本的和普遍的信任,它本身将面临瓦解(郑也夫,2006)。中小企业信任结构可以从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两方面来探讨。特殊信任主要指与个人或组织通过系谱、血亲、朋友、同事等亲近关系或长期较为稳定的熟知合作关系而达成的信任,普遍信任主要指没有亲近关系或稳定熟知合作关系的信任。例如,在内部管理中,二者的区隔体现在权力分配、人力资源安排等方面。中小企业的财务、人事以及核心技术等方面的权力一般掌握在与企业有特殊信任关系的行为者手中,而拥有非特殊信任关系的行为者的工作则更多涉及微观执行等具体工作。可以看到,中小企业主往往倾向于强化信任型社会资本的积累,通过“拟亲化”与“泛家族化”来加强内部管理。再比如,在内外部资源交换与整合中,拥有特殊信任的组织间更容易获得资源交换和支持,而普遍信任则更多依赖于具有法律强制约束的措施来保证资源的顺利交换。再比如说,在适应外部环境中,拥有特殊信任的行为主体间更乐于采用合作与帮助方式共同抵御环境风险,而拥有普遍信任的行为主体间在合作时则需加入投资回报的考虑,或者甚至不考虑合作。

下面以重庆某餐饮中小企业为例,试图构建中小企业的信任结构,从而进一步探讨信任型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的互动。该餐饮企业创办于1996年,资产达8000万元,员工250人左右,主要经营中餐、火锅和小吃,企业设有6个分店,张总为该企业总经理和最大控股者。公司主要管理层有家族成员3人:弟弟、侄子、女儿,分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销售经理、某个分店经理、财务经理。同时,张总还通过同学渠道安排亲信担任分店经理、采购主管、人事主管等。公司从1996年到2000年期间没有相对正式的规章制度。2000年由于内部财务和运营管理出现混乱,企业遇到了创建以来的发展瓶颈,争取了家人的支持和帮助,其弟弟加入公司并负责财务管理。之后张总女儿加入公司担任财务经理后,

其弟弟升任公司副总经理兼销售经理。2003年企业资产达到1000万元左右,各项规章制度开始规范化,但在操作上不能落实,制度很大程度被悬置,“都是自己人,都有人情在,大家也都不怎么当回事”。不过张总认为,“公司推行制度化势在必行,是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之后张总尝试逐步放权于经理人,但始终对经理人不能完全信任,认为“人性复杂”,主要担心在于其品德和能力。直到2007年公司资产达到了4000万元,分店的经理才实现由聘用经理人担任,但对其采购、财务等指标的监督和要求非常严格。对于拥有特殊信任关系者和普遍信任关系者的管理,张总直言,“以前对待家族成员基本没有什么管理规定,采取围一桌、面对面地沟通交流,考核标准也比较模糊,没有重大的失误就可以,每到年底也有额外的分红。”但对于没有特殊信任关系的员工,该企业聘用时就会明确各项规定、考核和要求,大部分签署劳动合同。这个例子清楚地反映了该企业从权力、人事、利益分配诸多方面表现出拥有特殊信任者与普遍信任者之间明显的差异性。根据之前的探讨,信任结构可以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两方面,由此构建了中小企业的信任结构。

由此可知,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信任型社会资本在组织的信任结构里发挥着建构作用,这个信任结构会对企业的成长与发展质量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如图1所示,信任结构从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两个方向出发,与企业发展质量的三方面核心要素进行互动,包括内部的管理机制、内外部的资源交换与整合、外部环境应变弹性。这种互动使得中小企业在成长的不同阶段形成相对动态平衡,这个平衡既有利于巩固组织的信任结构,充分释放信任型社会资本的能量,又有利于保证企业的发展质量,最终形成信任型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本文认为,对于信任型社会资本的存在和价值,以及中小企业发展质量与信任结构的互动,应回归到中国社会生活的特质、中国市场资源的分配机制和中国经济社会改革转型的时代背景中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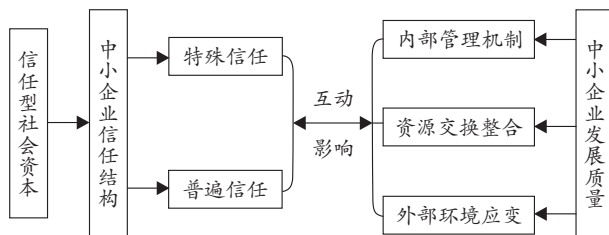


图1 信任型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

第一,中小企业内部管理面对的社会环境特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差序格局”特质,使得社会伦理结构从个人转移和扩大到组织成为可能与可行。虽然以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呈现的社会资本在几乎所有国家中都发挥着相当程度的作用,例如伯迪尤讨论过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移问题(Bourdieu, 1994),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东亚社会的儒家文化圈中,社会网络与关系的作用很大程度被强化了。儒家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弹性,“泛家族主义”使得家的概念、家庭的结构形态与运作原则、家族内部习得等延伸、泛化到企业组织层面(陆林,2011)。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特殊主义”观念与行为盛行于社会生活是中国社会关系的突出特点(李路路,1995)。我国中小企业内部管理模式呈现为明显的“差序格局”,人们在互动中发展出一套稳定的关系来持久、有效地维持人际关系(薛天山,2004),就是那种按照血缘、亲缘、地缘向外依亲疏远近而进行的人际互动模式。处于企业管理核心层面的多为中小企业主自身或与其有关的家族成员,向外一层则是与企业主亲缘关系密切的“自家人”,处于边缘状态的则是雇佣形式的普通员工。前二者拥有的是特殊信任关系,后者则是拥有普遍信任关系。从权力分配上看,企业的实际控制权集中在核心管理层,关键权力、核心技术、财务等重要职位通常由与企业主亲缘关系密切的人掌握,而非关键的权力才交给一般员工(李新春,2005)。

第二,中小企业内外部面对的资源分配机制。一般认为,社会资源最主要有两种分配方式类型,一种是市场的,另一种是非市场的,亦即市场过渡理论(撒拉尼,1983;维克托,1989)中称为的市场经济以及“再分配经济”。一些学者认为,在体制转轨和资源分配过程中,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



理清,经济资源逐渐市场化,但是政府权力边界不够清晰,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行政权力得到实质性的强化等,使得权力能以市场化的方式参与资源分配,因此形成了依靠市场的和依靠国家行政权力两种基本类型。这样的分配方式与前面提及的中国社会环境特质相结合,导致这种非正式社会网络能够成为资源分配的重要渠道。值得指出的是,在产业和行业纵深的链条上,与政府、市场、行业竞争者等主体之间拥有特殊信任的中小企业,更有机会进入所谓的非竞争市场。由于企业与各利益攸关方关系的复杂性,大多数情况下,企业间更倾向根据彼此间的信任程度和性质,作为进行内外部资源分配交换的标准,而不选择市场商品交换和强制性分配方式。通过此类特殊信任得到所需社会资源,可以在复杂多变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李路路,1995),因而中小企业倾向于不断积累这种信任资本特别是特殊信任,并在一定范围内相互支持和协作(周翔,2009)。

第三,中小企业环境应变面对的经济改革转型。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进程不断推进,通过协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逐步向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转变;由此,市场和社会拥有了更多发挥空间。这对我国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长期以来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不同步的实际,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政府行政权力分配社会资源的效力逐步减弱,但市场关系又没有系统建立健全的模糊过渡空间,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特别是信任型社会资本,并通过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来建立和维护信任关系、进行交换和寻求支持,协同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不仅是结构转型中相对于正式渠道的替代性形式,也是一种更便捷地增强应变风险能力的形式。与我国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具有诸多先天不足,加之信息不对称、不规范竞争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制约,当市场风险来临时,中小企业通常不具备应有的抵御和应变能力。值得指出的是,拥有丰富的信任型社会资本,特别是特殊信任关系的中小企业,往往能够在风险来临前从特殊信任关系方面预知大概,提前做好相关战略规划和战术调整;或者是风险来临时,能够通过信任程度较深的政府、市场、合作者等方面获得各种形式的帮助和支持,以顺利渡过风险和动荡,从而降低企业损失,甚至能够捕捉新的发展机会。

#### 四、探讨与结论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与关键性测量指标,它作为一种社会资本通过社会网络和结构嵌入到了经济社会和企业行动当中,信任机制和结构的良性运行与中小企业的发展质量是紧密相关的。信任型社会资本是中国社会生活的特质、中国市场资源的分配机制和中国经济社会改革转型的时代沉淀和变迁的产物,它在中小企业的信任结构中发挥着影响和建构作用。这个信任结构通过与中小企业的发展模式的互动,深刻地影响着中小企业的发展质量。因此,正确认识信任型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性,结合企业实际进行相应的策略性操作,应成为中小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加强对信任型社会资本的认同,保证在“质”和“量”上的优势获得。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中,经济社会双重转型,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挑战,它们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多依赖于信任关系的建立与社会资本的获得。信任型社会资本在“质”和“量”上的优势获得,将帮助中小企业实现内外部资源的交换和整合、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企业内聚力等,从而更有效地开展企业的各层级管理和内外部活动,提高环境适应能力,以支撑中小企业持续发展。那些获得更多信任型社会资本的中小企业,特别是特殊信任关系资本,会在企业内部管理、内外部资源交换和应变环境等方面拥有更多的优势和便利,会在经济社会的改革竞争发展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更有利于保证和优化组织的发展质量。

第二,完善中小企业信任机构,推动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的融合和发展。在中小企业的信任结构中,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之间既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必要性,也存在着一种不言而喻的张力。首先,应适度加强对特殊信任的制度性约束,在企业权力控制、利益分配、人力晋升等环节应注入更多的理性因素和客观成分,有礼有利有节地对家族模式或泛家族模式进行“创造性的破坏”。其次,应加强对普遍信任关系的认同,中小企业需要逐步改变对职业经理人的“根深蒂固的怀疑”,根据企业实际逐步实现产权和

经营权的分离,探索进行控制范围内的股权分化和优化。再次,应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的契约制度,用更加规范的合同、协议来保障利益主体之间的各项权利和义务,这也是降低各个利益主体之间不信任程度,从而保障企业整体信任环境的必须必要。

第三,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与逐步规范的市场体系中实现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经济社会改革转型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可能和现实土壤。中小企业本身具有不断发展的企业家冲动与需求,当正式的制度安排无法满足中小企业发展的适当条件时,就需要找到弥补不足所需要的替代物,以建立社会交往所必需的基本信任预期。这种非正式的关系是因为正式制度安排不足而作为替代物出现的。虽然这种信任型社会资本既有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避免不规范的市场体系可能给企业带来的损害;但值得指出的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市场体系正在成形和释放能量,中小企业应立足战略高度,充分运用信任型社会资本,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逐步建立起相应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从战略上保证企业发展的质量,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

#### 参考文献:

- [1] 福山,1988:《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
- [2] 陆林,2011:《信任与组织:民营企业差序格局管理模式探析》,《西南大学学报》第11期。
- [3] 李路路,1995:《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社会学研究》第6期。
- [4] 李新春,2005:《信任、忠诚与家族主义困境》,《管理世界》第5期。
- [5] 韦伯,1995:《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
- [6] 王绍光、刘欣,2002:《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社会学研究》第3期。
- [7] 薛天山,2004:《当下信任困境之成因浅析》,《社会》第6期。
- [8] 许晓红,2005:《论信任型社会资本对私营企业的影响》,《南方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3期。
- [9] 郑也夫,2006:《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10] 周翔,2009:《中国民营企业的社会资本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第3期。
- [11] Granovette,1985,“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 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2] Inglehart, 1999, *Trust: Well-being and Democracy In Warren Mark, Democracy and Tru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e Study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from Social Capital Based on Trust to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i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Jia Liwen and Lu Lin

(School of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sic peculiarities in Chinese society, the allocating resources system of the market and the economy reform and society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at trust is the core element and important form of social capital. And particularistic trust and universalistic trust form its structure together. The operation of its structure has contact with development quality i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closely. And it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resource ex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 Abundant social capital will bring great benefits to the improvement of development quality and reforming promotion.

**Key Words:** Trust; Social Capital;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Quality

■ 责任编辑 罗英